



列 宁

反对教条主义和
書呆子習气



121216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反对教条主义和 書呆子習气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01515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列宁
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

В. И. Ленин
ПРОТИВ ДОГМАТИЗМА
И
НАЧЕТН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7 年版译出

列 宁

反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3}{4}$ · 字数 41,000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定价 (5) 0.17 元

统一书号 1001 · 370

目 录

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	1
無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10
关于政治同教育的結合.....	18
論馬克思主义历史發展中的几个特点.....	22
論策略書.....	27
說明	27
第一封信：对时局的估計	28
論我国革命（許尼·苏汉諾夫的札記）	40
一	40
二	42
給伊涅薩·阿尔曼德的信（摘录）（1916年11月30日）	44
注释.....	46

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

在黨綱草案上，我們曾提出了關於建立有民主憲法的共和國的要求，這個民主憲法並應當保障“承認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這樣的綱領要求，有許多人以為是不十分明確，所以在第33期上說到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黨人的宣言時，我們曾解釋了這一條的意義如下。社會民主黨將始終反對那種想用暴力或用任何不公平的方法從外面來影響民族自決的一切企圖。可是，無條件地承認爭取民族自決自由的鬥爭，這並不是一定要我們贊助民族自決的任何要求。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積極的和主要的任務不是促進各民族的自決，而是促進各民族中無產階級的自決。我們應當始終和無條件地努力於各民族無產階級的最親密的聯合。只有在個別的特殊情形之下，我們方能提出和積極贊助建立新的階級國家或以比較軟弱的聯邦統一來代替一國完滿的政治統一等等要求^①。

對於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的這種解釋，曾引起了波蘭社會黨¹的堅決抗議。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這篇文章上（1903年3月《Przedświt》）^②，波蘭社會黨因為我們的“玄妙的”自決有這樣的“奇怪的”解釋和“含糊色彩”，表示憤怒；它責罵我們陷於理想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說我們認為“工人只要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其餘什么都不要管，因為語言、民族、文化

① 參閱“列寧全集”第四版第6卷第291—294頁。——編者注

② “黎明報”。——編者注

等等据说都只是資產階級杜撰出来的，以及其他等等的話”。这个論据把社会党人对民族問題的各种極平常極普遍的誤解差不多都暴露出来了，因此值得把它詳細講一下。

为什么我們的解釋这样“奇怪”呢？为什么認為它是离开“字面的”意思呢？难道承認民族自决权就要贊助任何民族自决的任何要求么？要知道承認一切公民自由联合的权利，并不一定要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贊助組織任何新的联合，并不妨害我們發言和鼓动来反对組織某种新联合的觀念的不适当和不合理。我們甚至承認耶穌教徒有自由鼓动的权利，可是我們反对（当然不是警察式的反对）耶穌教徒与無产者的联合。因此，当“黎明报”說：“假使自由自决这个要求应当按字面的意思去了解（而我們直到現在是这样了解它的），那末，这个要求就能使我們滿意了”，——可見違反綱領上字面的意思的正是波兰社会党。从形式方面看来，它的結論的不合邏輯是無容疑義的。

可是，我們不願只限于从形式上审察我們的解釋。我們也要在实际上直接提出这个問題：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無条件地始終要求民族独立，还是只在某些条件之下并且在哪些条件之下？波兰社会党解决这个問題时始終主張無条件地应当承認民族独立。因此，它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好感，这是絲毫不足使我們惊奇的，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要求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張“完全無条件地承認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²，第18期，“民族的束縛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文）。可惜这只是一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空話，这种空話千百次地指出了所謂社会革命者的所謂党的真正本質。波兰社会党为这种空話所欺騙，为这种囂張論調所迷惑；它这样正是証明：它在理論意識上和政治活动上，与無产階級階級斗争的联系，是何等的薄弱。我們正是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这一个斗争的利益。我們对民族問題的提法与資產階級民主派对民

族問題的提法，其差別也就在這個條件上。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跟着它的足跡走的現代社會黨里的機會主義者），以為民主制度可消除階級鬥爭，所以他們很抽象地、籠統地、“無條件地”用“全民”利益的观点或甚至用永久不變的道德絕對原則的观点來提出自己一切的政治要求。社會民主黨人隨時隨地都在無情地揭露這種資產階級的幻想，不管它表現於抽象的唯心主義哲學上還是表現於提出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上。

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有條件地而且正是在上述的條件之下承認民族獨立的要求，這一點如果還要證明，那末，我們就來引一個作家的話，這個作家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上捍衛了波蘭無產階級提出的波蘭獨立的要求。卡爾·考茨基在1896年的“波蘭亡了嗎？”這篇文章上寫過：“波蘭無產階級只要一關心波蘭問題，他們就不能不主張波蘭獨立，因此而不能不歡迎在這一方向中現在即可實行的每個步驟，要是這一種步驟與國際作戰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一般地是相容的話。”

考茨基繼續說道：“這一個附帶條件，無論如何是必須加上的。民族獨立與鬥爭中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並不這樣不可分離地聯系着，以至於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無條件地要努力於民族獨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十分堅決地主張意大利的統一和解放，可是這并不妨害他們在1859年反對意大利和拿破侖聯合。”（“新時代”³第14卷，第2冊，第520頁）

你們可以看到：考茨基絕對反對無條件地要求民族獨立，他絕對要求不僅要在一般的历史基礎上來提出問題，而且正是要在階級基礎上來提出問題。假使我們來觀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波蘭問題的提法，那我們就會看到：他們一開始也正是這樣提出了這個問題

⊖ 仿體字是我們用的。

題。“新萊茵報”⁴曾就波蘭問題發表了許多文章，它不僅堅決要求波蘭獨立，而且還堅決要求德國為波蘭自由而對俄國宣戰。但同時，馬克思曾攻擊盧格。盧格在法蘭克福的國會里曾發言主張波蘭自由，但只用關於“可耻的不公道事情”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空話去解決波蘭問題而不作任何的歷史分析。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最怕在革命的歷史關頭上“爭辯”，馬克思就不是這樣的人。馬克思無情地嘲笑“人道主義的”盧格先生，根據法國北方壓迫南方的例子告訴他，並不是任何的民族壓迫而且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引起民主派及無產階級所認為合法的獨立要求。馬克思引了一些特殊的社會條件，由於這些條件，“波蘭已成了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革命部分……甚至一部分還站在封建基礎上的波蘭貴族，也帶着空前的犧牲態度贊助了民主的土地革命。當德國還處於最粗陋的立憲思想和矜夸的哲學思想狀態中的時候，波蘭已經成了歐洲民主運動的發源地……當我們（德國人）還幫助壓迫波蘭時，當我們還使波蘭的一部分受着德國的束縛時，那我們自己就還是受俄國和俄國政治的束縛，我們自己也不能在本國徹底地解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創立民主制的波蘭是創立民主制的德國的首要條件。”⁵

我們所以這樣詳細地摘引這些話，是因為它們很明顯地指出，幾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期內國際社會民主黨對波蘭問題的提法，是在哪些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不注意從那時到現在的千變萬化的條件，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舊的決定，這就是忠於學說的字面而不忠於學說的精神，這就是背誦過去的結論，而不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新的政治局面。當時與現在，最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時代與拚命的反動，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一切勢力極端緊張的時代，這兩個時代彼此的區別是最明顯不過的。當時，正是整個波蘭，不僅農民，而且貴族群眾也是革命的。為民族

解放而斗争的传统竟这样有力和这样深刻，即在本国失败之后，波兰的优秀子弟曾到处帮助革命阶级，冬布罗夫斯基和弗鲁布列夫斯基⁶的名字，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与巴黎工人最后一次的——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失败的——暴动彼此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当时，如不恢复波兰，欧洲民主制的完全胜利的确是不可能的。当时，波兰的确是反沙皇制度的文明的柱石，民主制的先驱。现在，波兰的统治阶级，德国和奥地利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和财政大王，都起来拥护那些压迫波兰的国家里的统治阶级，而与英勇地承受过去革命波兰的伟大传统的波兰无产阶级一起的，还有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邻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代表，仔细考察欧洲的政治发展和完全同情于波兰人的英勇斗争；他们公开承认：“彼得堡现在已成了比华沙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国革命运动比波兰革命运动有更大的国际意义。”还在1896年，当考茨基主张在社会民主党人纲领上可以要求恢复波兰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过。而在1902年，梅林考察1848年到1902年间波兰问题的演变的时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假使波兰无产阶级想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恢复波兰的阶级的国家（关于这种恢复，各统治阶级自己连听都不愿听）的要求，那末，它就会排演出一出历史的滑稽剧：有产阶级是会作这种事情的（如1791年的波兰贵族就作过这种事情），可是无产阶级则不应降到这种地步。假使把这种反动的空想提出来为的是要把那些还相当响应民族鼓动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鼓动方面来，那末，这种空想就加倍值得斥责，因为它是一种不值一钱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机会主义贪一时微小的和便宜的暂时胜利而牺牲工人阶级的深切利益。

这些利益绝对地要求：在瓜分波兰的三个国家内的波兰工人，与自己同阶级的同志肩并肩地共同斗争，而没有任何的隐瞒思想。

在从前，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創立自由的波兰；在現在，只有用社会革命，在現代無产阶级打斷自己的鎖鏈时，波兰的复兴才有可能。”⁷

我們完全同意梅林这个結論。我們只要指出：即使在論据方面我們沒有像梅林跑得那样远，这个結論还是千真万确的。無疑的，現在的波兰問題的情形与五十年以前根本不同了。可是現在这个情形是不能当作永久的。無疑的，現在的阶级冲突已把民族問題远远地推在后面，可是还不能絕對肯定說（如果不想陷于理想主义的話）：某个民族問題就不能暂时出現于政治舞台的前面。無疑的，在資本主义未顛复以前，波兰的恢复只有極少的可能性；可是，不能說它絕對沒有可能，不能說波兰资产阶级不能在某种局面之下站到独立方面来等等。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点也不来束縛自己的手足。当它在自己的綱領上承認民族自决权时，曾估計到各种可能的，甚至各种一般可以設想的局面。这个綱領絕對不否認波兰無产阶级提出波兰自由独立共和国口号的可能性，虽然在社会主义以前，它的实现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这个綱領只是要求：真正社会主义的党不要淆乱無产阶级的意識，不要蒙蔽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空話来欺騙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無产阶级現代政治斗争的統一。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們才承認民族自决。全部实質也正是在这个条件之内。波兰社会党把事情描写得这样：似乎它之所以与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歧，是因为后者否認自决权，否認要求自由独立共和国的权利。不是这点，而是忘掉阶级观点，用沙文主义蒙蔽阶级观点，破坏目前政治斗争的統一，——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們不能把波兰社会党看作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請看波兰社会党对問題的通常的提法吧：“我們只能使波兰脱离俄国以削弱沙皇制度；而俄国同志則应推倒沙皇制度。”又如：“……专制制度推翻之后，我們不过是这样来解决自己

的命运：使波兰与俄国分离。”看吧，甚至从綱領要求恢复波兰这一观点上看来，这个奇怪的邏輯得出何等奇怪的結論。因为恢复波兰是民主进化可能的（但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大概是絕對沒有保障的）結果之一，所以波兰無产階級不能与俄国無产階級共同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只应”使波兰脱离俄国以削弱沙皇制度。因为俄国沙皇制度与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結成日益亲密的联盟，所以波兰無产階級应当削弱自己与俄、德等国的無产階級的联盟，虽然現在它与它們都在反对同一种压迫。这無非是为着資產階級民主派对民族独立的了解而牺牲無产階級最迫切的利益。我們以推翻专制政体为目的，而波兰社会党則与我們的目的不同，它以想分散俄国为目的；当經濟發展将使一个政治整体的各部分更紧密团結的时候，当各国資產階級日益亲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公敌（無产階級）和拥护它的公友（沙皇）的时候，所謂分散俄国永远还是一句空話。可是，現在受专制压迫的痛苦的無产階級力量的分散，这倒是悲慘的实情，倒是波兰社会党錯誤的直接結果，倒是波兰社会党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公式的直接結果。为要掩飾無产階級的这种分散起見，波兰社会党就不得不降到沙文主义的地步；例如，它不得不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如下的解說：“我們（波兰人）应当期待社会革命，而在社会革命以前則应耐心忍受民族压迫。”这簡直是造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这样劝人，而且正是相反，他們自己反对并号召全体俄国無产階級反对俄国的一切民族压迫，他們在自己的綱領上不仅提出語言、民族等等完全平权的要求，而且还提出承認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的要求。假使在承認这种权利的时候，我們使我們帮助民族独立的要求服从無产階級斗争的利益，那末，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以俄国人不相信外族人这一点来解释我們的立場；因为实际上，这个立場是从觉悟的無产者不相信資產階級这一

点上所一定应当产生出来的。波兰社会党这样观察問題：以为只要把“我們”（波兰人）和“他們”（德国人、俄国人和别国的人）对立一下，就了結了民族問題。而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提出这样的对立：“我們”——無产者和“他們”——資產階級。“我們”無产者已屡次見過，当資產階級看見革命無产階級起来的时候，資產階級怎样叛卖了自由、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們見過，在法国民族受着最厉害的压迫和屈辱的时候，法国的資產階級怎样把自己卖给普魯士人，护国的政府怎样变成了卖国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怎样求助于压迫民族的兵士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本国人——無产者。因此，我們絲毫不怕沙文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攻击，始終将要告訴波兰的工人：只有与俄国無产階級作最完滿最紧密的联合，才能滿足目前的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保障完全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解放。

我們关于波兰問題所說的話，对其他一切民族問題也是完全适用的。专制制度的令人詛咒的历史，把这个专制制度所压迫的各民族內工人階級之間極大的隔膜，遺留給了我們。这种隔膜，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最大的祸患和最大的障碍。我們不应認这个祸患是應該的，不应用什么党的分立性或党的“联邦制”的“原則”使这种丑恶現象成为神聖現象。最簡便的当然是走阻力最少的道路，各人独自建立小門戶，“各人自扫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現在的崩得就願这样做。我們愈覺悟到統一之必要，愈深信沒有完全統一就不能共同进攻专制制度，在現時政治制度之下，斗争的集中組織愈是必需，——則我們就愈不能滿足于問題的表面上似乎“簡單的”和實質上非常虛偽的解决。假使不了解隔膜的危害处，假使不想無論如何要徹底消灭無产階級党內的这种隔膜，——那就用不到“联邦制”的假面具，那就用不到来着手解决問題，因为有一“方面”實質上不想解决这問題，那时最好还是讓实际經驗和实

际运动的教訓去說服：为了受专制蹂躪的各民族內的無产階級反对这个专制制度和反对日益紧密团結的国际資产階級的斗爭的胜利起見，集中制是必要的。

載于1903年7月15日

“火星报”第44号

按“列宁全集”第四版第6卷

第412—420頁原文刊印

（載“列宁文集”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無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專政⁸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問題之被提上日程，与其說是由于事变的进程，無宁說是由于某一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論上的議論。我們在两篇杂感文（載第 13 期和第 14 期）^①中已經分析过首先提出这个問題的馬尔丁諾夫的論調。但是看来对这一問題的興趣是如此之大，而上述議論（請特別參閱第 93 号“火星报”⁹）所产生的誤会又是如此之深，以致必須再来談一談这个問題。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已經估計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們势将不止于从理論上解决这个問題，但是明确最近的目标对党說来無論如何还是必要的。不明确回答这个問題，在目前就不可能有坚定不移而又斬釘截鉄的宣传和鼓动。

我們且来恢复这个爭論問題的實質。如果我們所要求的不仅是专制政体方面的讓步，而是把它徹底推翻，那末我們就必須力求用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沙皇政府，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一方面将在真正普遍、直接和平等选举权以及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會議，另一方面又能实际保證选举的完全自由进行。那末，有人要問，社会民主工党是否可以参加这样的临时革命政府呢？我們党的机会主义翼的代表，如馬尔丁諾夫，还在 1 月 9 日以前就首先提出了这个問題，而且他，以及追随他的“火星报”，都給予这个問題以否定的解答。馬尔丁諾夫力圖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引

① 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 8 卷第 247—263 頁。——編者注

到荒謬的地步；他吓唬他們說，当組織革命的工作进行成功，当我们党領導了武装人民起义，我們就势必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則是难以容忍的“夺取政权”行为，是对階級的社会民主党說来不能容許的“庸俗的若列斯主义”云云。

我們就来談一談这一观点的拥护者們的論調。他們對我們說，社会民主党一旦参加临时政府就势将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作为無产階級的政党，如果不企圖实现自己的最高綱領，不企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那样做，它就必定立时遭受失敗，并且只是使自己声誉扫地，只是对反动势力有利而已。因此，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能容許的。

这种論調的基础就是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談，把爭取共和国（包括我們的全部最低綱領）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談。社会民主党如果立即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那的确只能自討沒趣。社会民主党正是为反对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家”的这种糊塗观念进行了經常不断的斗争。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才一貫主张俄国面临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才要求把民主主义的最低綱領同社会主义的最高綱領严格区分开来。不是全党，而是个别具有崇拜自發性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在变革时期忘掉这一切。这种錯誤見解的拥护者之所以陷入对自發性的崇拜，是因为他們認為，事变的进程届时将迫使社会民主党违反自己的意志，而去着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我們的綱領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事变进程”的：崇拜自發性的人們恰恰恐惧的是这一点，恰恰恐惧的是我們綱領的正确性。但是他們的恐惧（我已在我的杂感文中力求給予这种恐惧以心理学上的說明）是荒唐透頂的。我們的綱領是正确的。正是事变的进程定將証实这一点，而且越是往后越是如此。正是事变的进程“迫使”我們必須为共和国进行

殊死的斗争，正是事变的进程将在实践上引导我们的力量、即具有政治积极性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恰恰指向这一方面。正是事变的进程必将使我们拥有大量来自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同盟者，而他们的现实要求恰恰是实行最低纲领。因此，忧虑过速地过渡到最高纲领简直是可笑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些来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在某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新的忧虑，即关于“庸俗的若列斯主义”的忧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决议¹⁰曾禁止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道参加政府，这是若列斯主义，就是说，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不自觉的出卖，是把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是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实际上根本无法获得的统治权这个虚有其表的东西来腐蚀无产阶级。

这种论调是同样错误的。它表明，主张这种论调的人虽然能够背诵良好的决议，但是并没有了解它们的意义；——虽然满口反若列斯主义的字眼，却并没有消化它们，因而把它们用得完全不恰当；——就是说，他们只是掌握了词句，而并没有掌握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的最近教训的精神。在主观上，若列斯是为了拯救共和国才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这种“尝试”的客观条件就是：共和国在法国已是既成事实，并且没有任何严重危险威胁着它；工人阶级拥有发展独立阶级政治组织的充分可能性，而部分地恰恰由于它的领导者过分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议会把戏而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在客观上历史已经向工人阶级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米勒兰主义者¹¹们却用微小社会改革的诺言拉开无产阶级，使它不去实现这个任务。

现在且来看看俄国。在主观上，前进派或帕尔乌斯之流的社会民主党，也想用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办法来捍卫共和国。但客观条件却同法国有天渊之别。在客观上，事变

的历史进程恰恰向俄国無产階級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簡明起見，我們用“共和国”一詞来标示它的全部内容）；这也是全体人民，即全体小資產階級和农民群众的任务；不进行这个革命就根本不能設想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独立階級組織的广泛發展。

請具体地設想一下客观条件的全部差別，并且請問：关于那些因迷惑于某些字眼的相同、某些詞句的类似以及主观动机的逼肖而忘記这种差別的人，應該怎样想呢？

既然法国的若列斯由于不正确地熱中于爭取共和国这个主观目的而拜倒于資產階級社会改革之前，那末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須放弃爭取共和国的严重斗争呀！聪明透頂的新火星派正是得出这样的結論的。

实际上，無产階級如果不同小資產階級人民群眾結成联盟，它就不可能进行爭取共和国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白嗎？沒有無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专政，那末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是渺無希望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嗎？我們正对之进行分析的这个观点的主要缺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毫無生气和墨守陈規，就在于它忽略了革命时期的条件。爭取共和国而又拒絕革命民主专政，这就恰似大山一方面決定同庫罗帕特金在奉天会战，同时却又事先放弃进入奉天的念头。要知道，如果我們革命人民，也就是無产階級和农民，想要“共同打击”专制政体，那我們也就必須同时把它共同打碎，共同鏟除，并且共同击退必然要有的各种使专制政体复辟的企圖？（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誤会，我們再来預先声明一句，我們所了解的共和国一詞，不仅仅是指政体，甚至与其說是指政体，無宁說是指我們的最低綱領所規定的民主改造的全部总合。）需要有真正小学生式的历史概念，才能把事情想像成緩慢而均匀地上升的直綫而沒有“飞躍”：先是自由派大資產階級爭取专制政体的讓步，然后是革